

2000年曾游湘西，到凤凰，参观熊希龄故居，简陋数室平房而已。后读周秋光接续其师林增光搜集大量档案而写成的《熊希龄传》，方知他早年生活多在芷江，一生事功也得明晰。

1870年，熊希龄出生于凤凰军家，早慧，二十五岁就高中进士，本可以前途无量，但他却参加了湖南新学，担任时务学堂总理（校长）。也就是说，梁启超在湖南的讲学，得到刘坤一、陈宝箴之支持，具体则由熊希龄操作。戊戌变法失败，他因偶然原因晚到京而逃过一死，受到“革职、永不叙用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的严厉处分。沉沦七年，只能读书兴学，办实业，积累资产的同时，也成为当时难得的西学通和财务专家。

1905年，得大臣赵尔巽、端方再三保荐，熊希龄方获起用，成为考察西方宪政五大臣的随员，责任是替五大臣写出考察报告，作为朝廷立宪的依据。熊对西方宪政虽也有相当了解，但自度不及杨度，更不及梁启超，遂在日本私见两人，委以责任。五大臣归国次月，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，依据文本居然出自朝廷通缉犯之手，好在当时隐瞒得很好，直到近年夏晓虹教授找到梁的原稿，方得定讞。

此后熊参与各种开拓与善后，实业与建设，名气越来越大。虽然他是最早支持共和的清廷官员，但在民国初期确曾走过一段弯路。他是袁世凯时期第一届内阁的财务总长，二次革命被镇压后，更出任内阁总理，虽有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时誉，但副署袁解散国民党的政令，实在让他背上了黑锅。1916年他退出政坛，自述虽“饱尝忧患”，但“受人愚

濠上漫与

斯世再无熊希龄

■ 陈尚君

弄，被人排挤，以洁身而遭污辱，以善因而得恶果，直视政治为罪恶，社会为蛇蝎”，有自解，更感厌恶，唯愿在“闭门终养”中度过余生。如果真这样，他只能以失败政客留名青史。

熊希龄晚年之所为，为其个人历史翻开绮丽的篇章。开端是1917年的顺直救灾。河北境内天雨连绵，山洪暴涨，五大河溃漫，灾民逾六百万，为“五十年来所未有”。他感慨“出仕十余年，从未直接为民做事”，乃允出任京畿水灾河工督办，为赈济灾民、根治水患尽了心力。此后在筹賑五省旱灾、筹賑湖南兵灾水患，以及救济京师贫困老弱，组织世界红十字会，他都积极参与，建立甚多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成立香山慈幼院。

他看到持续战乱和天灾，使许多幼弱儿童无家可归，更遑论教育，有限的赈济根本无法解决，决意成立永久性儿童教养机构，选中了距离京城三十里的前清行宫静宜园。当时此地尚属前清皇室管理，他动用各种资源，获得允许，乃召集名流富贾，征集善资，成立机构，建立校园，到1920年成立香山慈幼院。最盛时在校学生多达近一千六百七十人，从日常生活，到文化教育，到人格养成，生存技能，都由院方负担。熊希龄时时感到人员众多，经费紧张，虽竭蹶支撑，仍举步维艰。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工作实绩，得到公私各方支持。到1931年夫



《熊希龄传》
周秋光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
人朱其慧去世后，他更“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谓”，乃邀请亲友成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，将个人所有动产、不动产全数捐献社会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湖南开办十二项慈幼事业。所捐包括公债票、股票、房契三项，总计大洋二十七万五千元，白银六万二千两，且全部说明收入来源。他时有两女已嫁，一子残疾，自己六十三岁，仅每月取息四百元作生活费（已二百五十元，子一百五十元）。就我所知，当时一元可开一桌酒席，三元可为住家保姆一月薪资，可知他捐款之巨大。这种倾家资全部付与慈善之行为，古今均属罕见。

熊的最后十年，南京政府成

立，民族危机加剧，他以北洋旧人的身份，积极参与抗日工作，也足动人。上海“一二八”事变，十九路军浴血奋战，他致电军方，要“集社会资力，共商抚恤遗族办法。凡殉难将士之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之抚恤，均为设法照料。其无父母之子女，则尽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之教养，以慰忠魂而励将士。”认为这是“国人后死者之责，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”。长城抗战，他率儿女及救护队亲临前线，臂缠红十会袖章，白髯飘飘，慰问演讲，激励士气。行前更自书扩文云：“国难方殷，余当以身许国，马革裹尸，或遂其志。”做好牺牲的准备。淞沪战起，他恰从青岛迁沪，表示“国难当头，余亦国民一分子，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，以求良心所安”。乃设临时伤兵医院四所，难民收容处八处，医治伤兵八千多人，收容难民两万多人，日以继夜，劳心劳力。南京沦陷方仓惶离开上海，到香港仅一周就因旅途劳顿，加上刺激太深，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
熊晚年另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，是以六六高龄，迎娶三十六岁的毛彦文为妻。不但婚礼隆重，要客云集，加上“老夫六六，新妻三三，老夫新妻九十九；白发双双，红颜对对，白发红颜眉齐眉”、“旧同学成新伯母，老年伯作大姐夫”之类谑联风靡一时，更使中外瞩目。熊与妻朱其

慧伉俪情深，妻亡时他已六十一岁，本无意再娶，同穴墓也做好，夫妻共同财产全部捐出。改变初衷的原因，一是其女熊芷与内侄女朱曦的撮合，毛与朱为早年同学；二是他对毛的好感，特别是希望由毛继承他的慈幼事业。

毛为浙江江山人，金陵女大毕业后，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，当时很少见。当时毛任职于复旦大学，朱曦、熊芷劝说数月，毛方允接触。熊此后致毛第一信，自述“国难、家难同时并作，仆之观念消极万分”，加上病魔缠身，“仅欲得一看护，照料病躯而已”。又称“自觉生命将及垂萎”，得毛消息，“仆不仅为个人家庭幸福庆，且为所办慈幼教育事业无量数之儿童幸福庆”，即包含公私两方面之考虑。毛当然也有女性应有的慎重与犹豫，熊写了大量述情诗词，也曾俯躬到复旦宿舍久候，终于功德圆满。

老少婚当然引起许多揣测，男重色，女重财，毕竟是一般认识，事实则是基金会因熊新婚，建议将熊捐款全数退回，为毛拒绝，仅略增生活费而已。熊逝世后，毛随南迁之慈幼院奔走西南，将熊的工作继续光大。两人实际婚姻虽仅两年余，毛后终身未婚，九十岁后与当年的香山孤儿一起，将熊之遗骨自香港迁葬香山，为这一惊世婚姻画上最后句点。

作为政治家，熊希龄建树甚少，所作也颇多争议，但作为中国近代慈幼事业之开拓者，则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。他是传统士人，家国情怀始终萦绕心中；他也是新派人物，了解西学的理财家，虔诚的佛教徒，以慈爱之心恪尽社会责任。他的作为，值得今人记取。

诗性的历史

——蒙田与其笔下维吉尔的诗歌

■ 杨年

蒙田在其《随笔集》中罗列了众多不同时代的诗人，其中包括古罗马时代的卢克莱修、贺拉斯、奥维德以及维吉尔等人；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比特拉克、阿里奥斯托、但丁、塔索等人；当然还有法兰西诗人龙沙和古希腊诗人荷马。但蒙田在《随笔集》中尤为推崇古罗马诗人，究其原因，缘于他自身的成长环境，阅读古罗马书籍的心得以及出访意大利的境遇。

在蒙田的笔下，古罗马诗人创作的诗歌成为《随笔集》的重要来源。可以这样说，“诗歌”是他《随笔集》中艺术生活的“诗性表达”。“诗性”彰显出他对待历史真理的两重态度，一方面是“诗性的真理”，另一方面则是“基于史实的真理”。他并非只采纳任何一方，而是采取宽容的手法对待真理，即将两者一并纳入历史情境中。蒙田对于维吉尔诗歌和历史真理的关系，就采用这种理论的表达模式。

蒙田在《论维吉尔的几首诗》中，将维吉尔笔下的维纳斯深情描述成：“女神不再说话，雪臂勾住他的脖子，神在温柔的怀抱中不再犹豫，他感到全身火烧，热烈

穿透骨髓，骨架酥软无力。”一方面，蒙田把维纳斯美丽、缠绵、魅惑的一面用诗歌的艺术灵活呈现，并通过诗性的艺术加工成“浓情的历史话语”；另一方面，他跟随维吉尔一起回归历史情境，着力探求真实的维纳斯。这就是蒙田对历史真理两重性的实际体验。

当然，蒙田“诗性的表述”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，一是“特定主题”，另一是“特定事例”。就“特定主题”的层面来分析，它既是蒙田引用诗歌的衡量准则，也是他建立“诗歌艺术”与“特定主题”之间相互关联的通路。在蒙田的经验中，诗歌有助于特定主题所关涉的问题。以蒙田引用维吉尔的诗歌为例，他在《论维吉尔的几首诗》中所引用的诗歌类型十分广泛，其主题关于爱情，且比其他章节中谈论爱情的内容还要多。事实上，蒙田在谈论爱情时，赋予了诗歌重要的地位，因为诗歌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关键，也是激发读者想象力与表达欲望的品质。

蒙田选取的“特定主题”，与其所经历的生活，即“特定事例”不无关联。正如蒙田在《论身体力行》中所关注的焦点，

是叙述在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，亦即那段时间内，他从起初的无意识到逐渐恢复了感知力和记忆力。他的无意识并非是无法感知或无法触摸历史真理，而是有关“认知经验”的问题，这都是为了明确他对死亡的认知态度。也就是说，“他把自己无意识的行为和维吉尔关于‘死亡的象征就是手握自己的利箭’相互关联”。这也与蒙田的自身经验——“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”密切相关。蒙田之所以如此，目的是证实他所坚持的信仰，即“我们对死亡的熟知，将会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惧”。

需注意的是，尽管蒙田把“特定事例”看作实践自我与诗歌互通的重要手段，却无法说明“特定事例”比他的“理性思维”更重要。在蒙田的思维中，“之所以弱化学例的重要性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它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，至少也要在传统的标准里使用思想的较高模式。当然，对于它来说，事例是特定层次中经验的体现，而且它在传统的语境下是次于理性的”。蒙田此番话语是要表示：我给大家展现的特定事例是我听说过的，是我调查过的或者是我谈



论过的。我迫使自己不要妄图做出任何改变，哪怕是轻微的改变，或是在最无关紧要的环境下所做出的改变。

从上述言论中可以探明，蒙田选取特定主题与关注自身生活是“同质一体”的，这也是蒙田自身“诗性力量”的汲取之地。实际上，蒙田的《随笔集》是一种合成物的形式，这种复合材料表现出明显的、具有间断性的蒙太奇式的分析方法，即趣闻轶事一样的例证，回忆性质的引用句，以及最后的附加内容。蒙田把这些都视为一种“不相融洽”的混杂物。诚然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蒙田的《随笔集》的确具备“自由风格”的特色。